

## 王作跃：评美国“科学为人民”组织的1974年报告《两条腿走路的中国科学》

发表于 2022 年 04 月 07 日 由 舟巷

【作者2022年4月6日注：该文英文版最初于2021年9月发表在*Science for the People* (SftP) 杂志的“Special Collection 2021: Rereading *China: Science Walks on Two Legs*” (<https://magazine.scienceforthepeople.org/rereading-china/commentary>)上。感谢SftP杂志惠允在《华夏文摘》发表稍作修改的中文版。谨以此文纪念于10年前相继去世的我的老师方励之（1936年2月12日-2012年4月6日）和许良英（1920年5月3日- 2013年1月28日）先生。】

“中国突然成为美国关注的焦点。”这可能是 2020 年至 2021 年美国媒体的常见标题，反映出美中双边关系在新冠病毒和两国国内政治压力下所面临的紧张局势。但它实际上是《两条腿走路的中国科学》(*China: Science Walks on Two Legs*) 的开场白。这是1974年由美国激进组织“科学为人民 (Science for the People 简称SftP)”所发表的一份不同寻常的报告，讲的是前一年（1973年），在它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赞助下，一批美国青年对中国进行为期一个月访问的经历。近半个世纪后阅读它，可以说它既是一份历史文献，又是对科学、社会和美中关系的评论，既适时又有价值，并具有启发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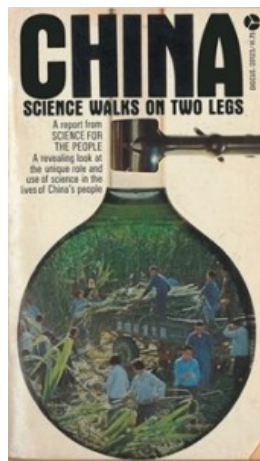


插图1: 1974年美国“科学为人民”组织所发表的*China: Science Walks on Two Legs*（《两条腿走路的中国科学》）一书的封面

该报告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是它证实了一个社会学观察：旅行者经常将他们的国内问题与他们在国外的经历联系起来。在该报告引人瞩目的导言中，作者明确表示他们访华的目的是考察中国实验以帮助找到解决美国棘手问题的方法：在美国，尽管医疗取得进步，但健康不安全仍在，并有伴随工业化和农业工业化而来的环境污染，以及科学技术的军事化。作为后者的例子，报告指出，新问世的计算机，不仅是一种“神奇的思维机器”，而且还是美国在东南亚进行不公正战争和在国内建立监视国家的工具。不幸的是，这些现代化的不良影响至今并未消失。

作者是否在中国找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似乎他们找到了：“中国的科学，在系统地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意义上，正在成为全民的财产，正在将所有问题整合为一种科学方法论。这些问题包括生产、技术、教育、医学、社会关系、基础研究、规划等。”换句话说，他们在中国看到了“科学为人民”的尝试。作者随后坦率地承认，“我们相信我们的所见所闻”，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不熟悉中文，还因为他们有“明显的政治偏见”，这意味着他们可能想相信他们所看到的。

该报告提供了几个具体例子，来说明群众科学方法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是如何在中国发挥作用的：它不仅让普通人参与科学，而且说服受过西方培训的专业科学家与群众合作解决实际问题。一个是遗传学家谈家桢的案例。他告诉该报告作者，与农民合作进行蓖麻和棉花植物杂交等项目，“使他自己的研究更加有效和有益”。另一个案例是神经科学家张香桐，他对针灸（报告作者称针灸为“真正的人民科学”）进行科学研究，部分是为了帮助治疗耳聋患者。

正如我们现在所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中国科学家揭露了它残酷、黑暗的隐藏面，并否认他们早先告诉来访的外国科学家的说法。例如，谈家桢后来写道，他被迫与农民一起工作，是作为对他拒绝支持这种杂交提议的惩罚。他说他知道这种杂交是“连极其普通的常识都不知道”。【1】然而，张香桐则以更积极的态度回顾了他的针灸研究，尽管他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到针灸治疗耳聋的用途。【2】

在这一点上，分享一些个人经验也许是合适的，以说明报告作者以不无勇气的精神所阐述的题目，尤其是现代中国的科教政治，极具复杂性。1973年，当SftP小组访问中国时，我还是一个住在一个河南农村公社的十岁男孩。我不记得我是否在《人民日报》上读到当时的两篇关于他们访问的简短报道：在2月23日由物理学家周培源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为他们举办了宴会，然后在3月2日他们与科学行政官员刘西尧会面时举行了另一场宴会。反而是此前一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访问让我记忆犹新。我还记得那个时期我们小孩子们喜欢玩的一种扑克牌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我们称最大的牌为“尼克松”（仅次于他的第二大牌是“基辛格”，即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

更重要的是，尼克松的访问导致我上的初中开始教英语。回想起来，这为我1986年赴美国攻读研究生铺平了道路。但这条道路在1976年几乎脱轨了。文革期间的“教育革命”（如SftP的报告中所述）意味着升高中靠的是政治“推荐”，而非学业成绩。结果，虽然我母亲曾一再被告知，说我作为我初中最优秀的毕业生，肯定能上高中，但她还是沮丧地得知，我被另一个有政治关系的人顶替了。对我来说幸运的是，我母亲有一个远房亲戚，是公社的干部，所以她以我的学习成绩为由求助。最终，我的名字被用黑色毛笔“加”在了贴在高中墙上的印刷录取名单上。

对我来说再次幸运的是，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年。到我1978年高中毕业时，中国的大学已经开始以考试而不是推荐来录取学生。我进入家乡附近的新乡师范学院（现河南师范大学）学习物理，并于1982年去北京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中国科学院大学）读物理史硕士。我们这一年同专业有三个研究生，但我们有一个杰出的七人导师指导小组。从他们那里，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文革期间发生在科学家们身上的事情。在这七名科学家成员中，有“五个半”在1957年因批评中国共产党而被打成“右派”。这五人包括许良英教授，他是一位物理学家，在文革中被流放回家乡浙江从事体力劳动，并遭受了非人道的待遇。在1968年文革高潮时，许良英因抗议计划中的群众集会将要逼迫他跪地而自杀未遂。他活了下来，后来并与范岱年教授（上面提到的“五人”右派之一）在内的其他几位学者一起将爱因斯坦的著述翻译和编辑成三卷中文版发表。《爱因斯坦文集》涵盖的不仅是物理学，还有哲学和政治。【3】

那“半个”右派是方励之教授，他没有像许良英（或他自己在北京大学的物理学家妻子李淑娴）那样被正式打成“右派”，而是在1957年被中国核武器计划开除，1958年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文革期间，方励之被迫在地下煤矿以苦役的形式接受“再教育”。奇迹般地，他设法找到了一本苏联物理学家列夫·朗道的《经典场论》，并在晚上在蚊帐里偷偷地阅读。他后来成为中国天体物理学的领军人物。

1973年SftP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当然不允许他们会见许良英、方励之或其他数千名被指定为阶级敌人的科学家/学者。因此，不幸的是，人们不会在《两条腿走路的中国科学》里读到他们的经历，或者其他数百万在文革中遭受苦难的普通中国人的经历。这些人遭难或是因为他们出生在错误的家庭，或是因为没有正确的政治关系，或是因为有海外关系。

这些美国来访者也没有遇到像王淦昌这样的人。王淦昌是许良英上大学时的物理学教授，也是原子弹项目的主要设计师之一。他在国防技术部门工作，而这些部门并不总是实践群众科学。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这个运动在许多方面是文革的预演）中，刚从美国回来的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积极参加了北京街头消灭麻雀的群众运动。他之所以这样做，部分是为了回应他作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不与普通人打交道的批评。然而，高层领导得知此事后，向力学所党政干部发出严厉申戒：钱学森同志有着比打麻雀更重要的工作（研制导弹）去做。【4】

但在1978年，当SftP派第二个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如果他们要会见许良英、方励之或其他中国异见知识分子，至少在政治上是可以想象的。后者现在恢复了职业，他们对中国政治正统的持续、深入的质疑仍然被官方所容忍。

【5】不幸的是，这第二个代表团在如何评估中国在那个关键时刻的政治变化上发生了分歧，导致本来会记录他们的观察的第二个报告流产了——而这第二个报告本来有可能如第一个报告一样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到1980年代后期，许良英和方励之被视为中国著名的政治异见人士，方励之更被称为“中国的萨哈罗夫”（后者为著名的苏联核物理学家、人权活动家）而广为人知。1989年发生了镇压民主抗议者的天安门事件后，方励之和李淑娴在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寻求庇护，方励之并在那里写下了回忆录，其中包括文革的黑暗时期。它于2016年以英文版*The Most Wanted Man in China*（中国头号通缉犯）出版。【6】1990年，方励之夫妇获准前往英国；他们最终定居在图森，方励之在亚利桑那大学教授物理。



插图2: 1987年方励之、许良英摄于方励之北京家中

2008年，经方励之教授等人提名，许良英教授因其人权活动被美国物理学会授予萨哈罗夫奖。那时我已经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获得了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历史），并开始在该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教授美国历史和科学史。【7】由于许良英教授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国，我有幸在圣路易斯召开的美国物理学会2008年年会上宣读许良英先生的获奖者学术报告。我经常想知道，SftP的成员们，尤其是那些在1973年或以后有机会到中国旅行的成员们，是如何看待方励之、许良英和文革后的中国科学政治的。

回到这个报告上：尽管它的不全面性是公认的，但在1970年代初期，在美中两国相互发现的关键和激动人心的时刻，它仍然是两国科学和科学家交往的宝贵记录。它不仅可以与中国科学家自己后来的叙述结合起来阅读，也可以与在这一时期到中国访问的其他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美国科学家的叙述对比阅读。后者包括由政治自由/中间派的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简称FAS）赞助的那些代表团，由半官方的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简称CSCPRC）组织的各

种学科代表团，以及大批由留美华人科学家所组成的回国访问团（这些人在四分之一世纪后第一次重访祖国）。

## 【8】

SftP报告所代表的美中人文交流，现在不仅受到双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阻碍，而且还受到致命的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后者已经将两国之间的人员流动，至少短期内，减少到先前规模的一小部分。【9】一如以往的历史模式，华裔美国人感受到来自日益加剧的美中冲突的压力：美国政府以涉嫌经济间谍等指控调查了一些华人科学家（也因此引发了种族歧视的批评），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在疫情开始之后激增。【10】

目前中美关系的转变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我们处理像本报告这样的历史文献的视角。例如，在平静的日子里，我们本可以更多地关注这本报告的政治层面，分析年轻的美国访问者和他们在中国的东道主之间的观点的异同，甚至美中两国内部的团体之间，如 SftP 和 FAS，或中国的年轻农民技术人员和西方培养的专业科学家之间意见的比较。现在，考虑到中美关系的严峻状态，这个报告更显著的特点也许是它所叙述的那次旅行居然发生了。如果中美关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恶化，我们是否最终需要重踏 SftP 1973 年代表团的脚印，再进行另一个重新发现的旅程？让我们希望它不会变成那样。毕竟，中美科学互动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如果没有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包括公共卫生威胁和气候变化危机在内的许多全球性问题将无法解决。

所评论的报告的英文版 *China: Science Walks on Two Legs*: <https://magazine.scienceforthepeople.org/wp-content/uploads/2021/09/China-Science-Walks-on-Two-Legs.pdf>

报告中文版《两条腿走路的中国科学——美国科学家访华观感》：<http://m.wywxwk.com/content.php?classid=21&id=400007>

参考文献：

【1】谈家桢，《生命密码》（长沙：湖南少儿出版社，2000年），第118页。

【2】张香桐，《灵性的王国》（长沙：湖南少儿出版社，2000年），第130页。

【3】有关许良英和现代中国科学政治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H. Lyman Miller, *Science and Dissent in Post-Mao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和 Miller, “Xu Liangying and He Zuoxiu: Divergent Responses to Physics and Politics in the Post-Mao Period,”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30, no. 1 (1999): 89-114。

【4】奚启新，《钱学森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第319页。另见 Iris Chang, *Thread of the Silkwor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238。

【5】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他们真正见过面的证据，并且有一个代表团成员说不记得见过他们（个人邮件）。

【6】Fang Lizhi, *The Most Wanted Man in China: My Journey from Scientist to Enemy of the State*, translated by Perry Link (New York: Henry Holt, 2017). 中文版方励之，《方励之自传》（台北：天下文化，2013年）。

【7】令人遗憾的是，2011年，当我的书 *In Sputnik's Shadow: The 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and Cold War America*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8) 被翻译成中文（《在卫星的阴影下：美

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与冷战中的美国》) 出版时, 因为政治原因, 致谢中提到许良英老师的部分得以保留, 但提到方励之老师那部分没有被保留。

【8】 一些相关研究见 Zuoyue Wang, “US-China Scientific Exchange: A Case Study of National Sponsored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ism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beyond”,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30, pt. 1 (1999): 249-277; Sigrid Schmalzer, “Speaking about China, Learning from China: Amateur China Experts in 1970s America,”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16, no. 4 (winter 2009): 313-352; and Pete Millwood, “An ‘Exceedingly Delicate Undertaking’: Sino-American Science Diplomacy, 1966-1978,”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56, no. 1 (January 2021): 166-190.。

【9】 David Sanger and Michael Crowley, “A Pivotal Reset on China Policy by Biden’s Team,” *New York Times*, March 18, 2021, A1。

【10】 Jeffrey Mervis, “U.S. Scientists Want Congress to Look into Complaints of Racial Profiling in China Initiative,” *Science*, [www.sciencemag.org](http://www.sciencemag.org), February 5, 2021。值得称赞的是, 拜登总统对反亚裔种族主义的反对力度比他的前任要强得多。后者因反复使用“中国病毒”一词而受到广泛批评。Joseph R. Biden, “Memorandum Condemning and Combating Racism, Xenophobia, and Intolerance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26, 2021, [www.whitehouse.gov](http://www.whitehouse.gov), and *New York Times* Editorial Board, “Asian Americans Are Scared for a Reason,” *New York Times*, March 18, 2021. Zuoyue Wang, “Chinese American Scientists and U.S.-China Scientific Relations: From Richard Nixon to Wen Ho Lee,” in *The Expanding Roles of Chinese Americans in U.S.-China Relations: Transnational Networks and Trans-Pacific Interactions*, ed. Peter H. Koehn and Xiao-huang Yin (New York: M. E. Sharpe, 2002), 207-334.

## 作者投稿

此条目发表在 华夏快递, 历史回顾, 各抒己见, 学术探讨, 遥望神州 分类目录, 贴了 HXKD、作者投稿 标签。将[固定链接](#)加入收藏夹。

本文短链接为 <http://hx.cnd.org/?p=208563>